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际影响力:特征、优势与效能

雷江梅 邢德祥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长期的探索与奋斗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既具有中国国情的特殊标识,亦拥有世界一般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包容普惠”的民族涵养特征,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和而不同”“共享共赢”的理念;具有超越世界现代性的国际比较优势,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个体利益为中心、新自由主义的局限;具有凝聚化解世界“现代性问题”共同体合力的国际交往效能,呈现为共筑开放包容的发展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协商共担的责任共同体以及合作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化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良方理路。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国际影响力; 民族涵养特征; 国际比较优势; 国际交往效能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1-0001-08

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以工业文明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生成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性强势话语,在现实社会展现的危机中遭受普遍质疑。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局部冲突不断升级、国际贸易制裁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世界愈发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0}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民族涵养特征: “包容普惠”

启蒙时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了世界现代

性的历史潮流。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扩张局势及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资本”很快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整个人类社会逐步迈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时代。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再是一国之事。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2]20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包容普惠的国际取向,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发展模式。

(一)现代化发展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1VSZ06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大变局中的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编号:21JHQ024)。

[收稿日期] 2025-11-25

[作者简介] 雷江梅,女,湖北枝江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邢德祥,男,山东聊城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其本质差别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3]2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着力点。这一工作导向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全部活动的思想脉络和价值主线。以人民为中心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必由之路。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4]19}。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理论,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最为突出的政治本质。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5]15}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探索中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理论。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开创了一条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打破了过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桎梏,实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真正核心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在政治体制的建设中,更是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展开。在经济领域,中国致力于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使人民能够分享现代化进程的果实,实现更加平等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中国注重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造,确保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社会建设领域,中国着力解决贫困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总体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特质所在。通过坚持这一原则,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为实现个体自由和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理念的发展和完善,将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 现代化发展格局:坚持“和而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同其他文明共同繁荣的道路。当今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同地区都生长着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人。尊重文明多样性不仅意味着要尊重世界各地文化特色,更意味着要维护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彩。习近平指出:“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6]324}不同文明都存在着自身特有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进互学互长和共同繁荣。习近平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6]259}文明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懈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相互交流、互相借鉴、相互影响。开放包容是推动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沉溺于封闭保守的思维中,文明则会失去创新和创造的生机。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源自华夏大地的独特文明,正是通过吸收融合其他文明的卓越成果而形成的独特风貌。近年来,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焕发新的活力。这种开放的姿态不仅有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全球文明的繁荣。因此,在文明交流中树立一种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理念,意味着要超越文明的隔阂,避免文明冲突。中国在尊重本国本民族实际的基础上,采取对外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态度。这并不是要放弃本土文化,而是要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以促进自身文明的进步。唯有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互补与共融,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明画卷。“和谐统一”与“和而不同”

的开放包容理念应当成为我们文明交流的座右铭。弘扬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念,实现文明的共同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境况下,西方发达国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最优模式,大力吹嘘“文明优越论”。然而随着世界历史的生成,人类多种多样的文明类型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竞相绽放。每一种文明都拥有着各自的优势,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不同优秀文明的共同创造。坚持“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才是新型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和而不同”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思想智慧、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成例相沿视为固然的铁则,也是我国贡献给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 现代化追求目标:坚持“共享共赢”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心系天下的民族体系,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心存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自身与外界和谐相处的传统基因,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这一相处之道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人们考虑天下大利,提倡“计利当计天下利”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对和谐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追求而著称。它倡导“天下为公”的社会秩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通过教育和道德修养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爱”,它提倡通过相互尊重和合作来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这种思想原则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倡导各国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智慧。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我们

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7]522}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坚定不移地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协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的美好愿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开放、合作与共赢的承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共享共赢”的国际发展目标,力求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的现代化朝着更加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向发展。“共享共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演绎和现代化转化,代表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人类社会逐渐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经验主义范式。随后,在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的双重影响下,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再次引发了对“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疑虑。“共享共赢”是对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政治担当和大智慧。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际比较优势:对世界现代性的超越与创新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7]34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可转化为实践行为方式,为世界提供可以借鉴的新型现代性方略,突破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中以西方中心主义、个体利益为中心及新自由主义的局限,为世界现代性发展与全球互联共通突显中国智慧的强大国际张力。

(一)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发展模式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以资本扩张

为基础的现代性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人的异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世界现代性发展的进程。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依靠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限制地剥削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不得与其劳动产品相分离。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资本家占有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劳动工人则一贫如洗。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8]190}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在资本无限制扩张的背后社会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看似繁华的商品经济背后逐步形成了物对人的统治,愈来愈多商品的产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望,使人们精神生活日益被物质所取代,其结果往往是日益繁荣的物质生活不仅没能推动人的进一步发展,反而成为阻碍人全面发展的枷锁。实际上,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其繁荣的发展景象就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蒙上一层“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世界一切的国家只有遵循他们的价值观,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才能够突破贫困走向现代社会。因此,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本身就带有世界霸权主义色彩。西方中心主义的源起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征服。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原有的传统性,为世界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之也产生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随着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美苏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于是便出现了更加极端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还是“美国中心主义”思想无不透露出资本主义在资本扩张驱使下的世界霸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当今世界出现的另一种新型现代化道

路,它突破了世界原有的以资本扩张为根基的世界现代性发展模式,改变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对世界现代性发展的禁锢,尊重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坚持和而不同、相互借鉴、共享共赢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二)超越西方个体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自启蒙时代以来,个人主义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影响渗透至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个人主义的兴起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演变紧密相连,对上层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促使社会价值观念逐渐以个体利益为核心,构建起以个人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是社会结构的主导者。资本的积累与分配机制,导致了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变,使得个体的经济利益成为首要考量。这种转变在个体主义理念的推动下,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模式,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模式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势,推动社会呈现出个人利益至上的格局。西方文化中的合作,往往以近期利益为前提的形式存在。这种合作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信任,而更多是为了提高个体竞争力和贪图更大的利益。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将个人利益视为主导行为的决定因素,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尤其是政权对个体利益的压制。当政治制度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倾向于寻求其他方式,包括反对政权、捍卫个人利益,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如暴力。这种个体主义的追求导致了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寡头和政治垄断的现象涌现被视为个人主义和金钱利益盲目追求的必然结果。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奉为楷模,试图将其他国家诱导至西方霸权的版图中,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势力得以扩张,进而影响其他文化和社会模式,困扰着整个国际秩序。然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争议,引发了对于个体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质疑。因此,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不仅是对现有社会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9]40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了与西方个体利益为中心的模式迥异的独特特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了一个注重整体发展和集体利益的国家发展范式。相较于西方的个体主义和市场自由,中国在实现经济迅猛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关键的引导和规划作用,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长期的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相较于西方的短期市场导向,中国采取了更为长远的眼光,通过明确的蓝图和目标,引导国家向着更加繁荣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计划性的做法不仅能够快速增强经济实力,并有效地应对内外部挑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注重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体系的改进,以及扶贫计划的实施,着力提高整体社会水平,确保更多人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与西方注重市场机制的个体主义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与西方强调竞争和自由市场的个体主义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采用了更加整体性的发展模式,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同等看重。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富裕阶层的繁荣,更关注广大人民的共同繁荣。这一理念体现在对贫困问题的坚决攻坚,以及对中西部地区的巨额投资,以促进全国各地的均衡发展。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超越了西方个体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更具应对国家层面挑战和机遇的能力。

(三)超越西方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对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动态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个人主义的积极一面在于,它不仅激发了个体追求物质财富的内在

动力,而且在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促进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解放,确立了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能动性和主导性。然而,个人主义的盛行也带来了个体孤立的现象,它将个体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确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推动了追逐资本暴利的自觉意识。个人主义所蕴含的文明元素,如主体意识的确立、人的独立性以及个体性品质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个人与利益紧密结合,将个人的“合理谋利”行为提升为社会价值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的创造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念也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和个体利益的过度追求,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在个人主义的促使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蔓延。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充分发挥经济领域中“看不见的手”作用,可以实现最有效的经济运作。他们强调经济自由、竞争自由和契约自由,以确保个人拥有最大限度地经济自由。在政治方面,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和国家则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而存在的手段和工具。在这个理念下,政府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导致经济上的极度私有化与政治上的虚假民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盲目模仿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而是在保持国家独立性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形成了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强调国家的集体利益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不仅仅关注个人自由和权利;通过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强大的国家实力,为人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和长远发展战略,注重国家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相

较于西方自由主义追求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国家的引导和规划,通过产业政策和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注重解决贫困问题和消除社会不平等。在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扶贫政策、推进教育医疗改革、加强社会保障等措施,不仅提升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还缩小了贫富差距,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超越在于注重整体利益,增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推进国家主导和市场有机结合,关注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的利益和幸福,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经验。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际交往效能： 凝聚消解世界“现代性问题”的共同体合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采取先污染后治理,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盲目追求产值产量,采用经济垄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利用资本输出掠夺殖民地国家资源,在资本主义霸权下爆发两次试图重新瓜分世界的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不断,金融危机频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世界环境问题严重,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些世界问题的出现无不显出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弊端。面临日益尖锐的全球性矛盾冲突,需要各国联合起来,探索一种新型的世界现代性发展模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7]37}这个方案主题就是创新世界现代化发展方式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一)积极践行并广泛传播新发展理念,逐步构筑开放包容的发展共同体

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1]468}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推动世界发展成为各国共

同关注的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还适应当代世界的发展呢?面对当代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中国道路给世界如何发展问题提供了自己独特的答案,那就是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倡议世界各国共同构筑开放包容的发展共同体。新发展理念是实现世界经济复苏、保障世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启蒙时代以来,世界现代性发展一直遵循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即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遮蔽下的资本最大化,其本质就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扩张和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开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与观念上的强制性输出。在这种观念下,凡是符合资本主义自由扩张的方式都是正确的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不合理的,其结果引发一系列的世界扭曲发展问题。中国道路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解决当代世界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新发展理念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及共享的发展。其一,创新发展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存在创新能力后劲不足、科技水平整体低下的情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无法实现科技创新就注定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其二,协调发展解决发展的平衡性问题。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摆脱发展的结构失衡和资源禀赋失衡问题,就成为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绿色发展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发展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它是当今世界产业变革的指向标。其四,开放发展解决内外联动的问题。相比之前,当今世界开放层次更深、开放领域更广,如何降低开放风险、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国际资源便成了世界各国研究的中心议题。其五,共享发展解决发展的公平公正问题。通过共享发展,相关各方都能够分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只有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禁锢,坚持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国际化,才能够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的健康发展,进而最大效率地恢复世界经济良性演进秩序。

(二) 推动建立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逐步构筑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10]。中国道路的出现打破了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价值分歧,建立了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引领世界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发展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追求。然而,自人类社会逐步走出传统迈入现代社会,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模式就统治了世界。在这种模式之下,许多大国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吞噬他们的利益。受这种排他心理驱使,必然会引起经济的乃至武力的冲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的世界逐步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给很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修昔底德”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的滥用,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从没有间断过。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联动效应越发凸显,任何一个国家故步自封都很难获得成功。解决矛盾和冲突需要世界各个国家都放弃原有的错误思维,树立起“合则赢,孤则弱”的价值理念,逐步打造出一个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国道路向来将合作共赢作为各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6]²⁷³此后,习近平又在众多国际会议中强调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多年来,中国道路一贯坚持彼此尊重、互相理解、减少对抗的理念,提倡世界各国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关系。可见,坚持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并不是中国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而是推进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明智之举。这种合作共赢的价值体系是中国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与纠正,是中国为推进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的实效

方略。

(三)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探讨和制定,逐步构筑协商共担的责任共同体

国际规则是维护国际秩序的支撑和保障,是世界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根基,良好的国际规则能够有效地规范国家间的交流方式,促进国家间合作与发展。国际规则的制定应该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之上,由世界各国共同商讨制定。然而,自现代社会以来,国际规则逐渐成了霸权国家追逐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手段。霸权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世界利益,牢牢地把握住国际规则的制定权。随着人类历史的逐步演进,这种霸权的方式逐步演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抗。面对世界发展的复杂局势与中国的逐步崛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均想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也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央,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及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秩序。在面临世界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往往没有中国参与就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国际共识。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历来主张在对外问题上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发展问题上主张构筑协商共担的责任共同体。如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所言:“中国参与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其目的不是对既有国际秩序中基石性制度的挑战,而是通过合作和磋商进行渐进式的、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带来效益的变革。”^[1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各项组织机构,勇于承担促进世界发展的大国责任。在世界治理与世界秩序维护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多边多元理念,主张发达国家应抛弃传统的霸权思维,以平等互利的态度协同建立起和谐的国际权力体系。正如习近平所倡导:“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7]⁵²³世界的发展需要各国平等参与,世界的命运也需要各国协商维护。协商共担的责任共同体既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又有利于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和谐。

(四)推动建立协作互助的区域合作体制,逐步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其间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世界“现代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必须树立起全球合作的意识,共同承担起生态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就当前整体的世界形势而言,资本主义盲目的物质追求极大地打破了人们对于生态的原有认知。基于此,必须提倡整个人类社会建立起生态共同体意识。中国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破坏生态以求利益最大化的老路,而要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新路。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39}由此可见,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不仅仅在于物质财富的多寡,还在于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程度。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活状态,人类在享受物质资料带来的满足感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环境的报复。当今世界存在许多阻碍发展的现代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国家可以置之度外。中国道路倡导世界各国从生态系统的消耗者这一角色转变为承担世界责任和义务的主体,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规律。世界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应当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本位意识,逐步消除国际间的隔阂与对立,共同维护生态平衡与协调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的新理念、新范畴、新思路,为推动全球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努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彰显出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时为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建成小康生活的辉煌,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做出重要示范,“十四五”

期间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成为拉动若干领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倡导的共同发展、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促进国际贸易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的若干成功经验可以引导激励更多国家走向开放、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不仅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为国际社会构建起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发展蓝图。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角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繁荣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11]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J].中国社会科学,2019(3):187-203.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国际化逻辑： 导向、基础及进路

刘国龙 张桐彤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是在中西文化互补互鉴和长期历史经验总结中逐渐走向成熟。在中国式现代化趋向,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与“和合文化”内在融通提供和平发展的理论逻辑导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建设夯实和平发展的现实逻辑基础;以独立自主到全球治理的实践探索展示和平发展的国际逻辑进路,从而造就既符合历史规律又体现主体选择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和平发展; 理论逻辑导向; 现实逻辑基础; 国际化逻辑进路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1-0009-09

一、理论逻辑导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与“和合文化”内在融通厘清和平发展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在历史和实践推动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经典理论为内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等理念为根本,形成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理论逻辑导向和基本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国际大视野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通过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53},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界限,消除阶级对立与剥削带来的冲突,最终构建“世界历史性”的和平秩序。这种以“消灭战争根源”为核心、以“人类解放”

为目标的和平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文化”“协和万邦”理念不谋而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奠定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强制和平”的虚幻性以及非公正性。它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剥削体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488}这清晰表明,马克思主义将国内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国际社会的和平问题紧密相连。要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战争与冲突的社会制度基础,即资本主义。他们所构想的“真正和平”,是建立在消除了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在那里,联合起来的自由劳动者将主导生产过程,国际关系

* [基金项目] 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思政专项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JDSZK143)。

[收稿日期] 2025-11-30

[作者简介] 刘国龙,男,山西太原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张桐彤,女,河北邯郸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将不再是民族国家为资本利益而进行的博弈,而是自由联合的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进行的协作。这种和平才是“各民族的国际主义联合”的和平,其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共同解放。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首先,中国道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强制和平”的批判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次,中国和平发展观创新性地实现了“真正和平”的阶段策略。恩格斯曾指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410}中国则从正面实践了这一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理念。一个民族唯有通过促进与其他民族的共同发展,才能确保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安全。这种以发展促和平、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化诠释。最后,中国道路将和平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放在“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上。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最终归宿是人的解放。中国的和平发展强调其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并为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它通过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弥合阶级、民族和国家的裂痕,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着实现“真正和平”的物质与社会条件。

中国道路践行“真正和平”的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指明了终极目标,但并未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提供详尽的和平外交手册。中国在不断摸索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等理念,致力于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通过共同发展来筑牢和平的根基。一个民族唯有通过促进其他民族的共同发展,才能确保自身的持续发展与安全。这种以发展促和平、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化诠释。

(二)“以和为贵”:中华和平文化的文明基因

中西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与实践,深

植于各自独特的文明土壤与历史哲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105}中国的和平发展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理念在当代的自觉体现。其中贯穿中华文明历史的“以和为贵”思想,为其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以和为贵”思想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内涵不止于人际交往的和谐,更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融合了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智慧,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思想体系。首先,“和”的本质在于“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多样性统一下的动态平衡。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种在承认并尊重万物差别的前提下,寻求共生共荣之道的辩证思维,为处理复杂多元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启示。其次,“和”的价值高于冲突,是优先的选择。孔子的弟子有若明确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意即在国家行为中,谋求和平、化解争端应视为首要的、最值得追求的价值。再次,孟子严格区分了“以力假仁者霸”与“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主张通过道德感召和仁政实践来使天下归心,而非依靠武力征服。最后,“和”的终极理想是“协和万邦”,构建普遍和平的世界秩序。《尚书·尧典》中便提出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恢弘愿景,描绘了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最终实现天下和谐的蓝图。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和”文化的核心,为当代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是建立在促进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更具包容性和长远性的利益观。它不再将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截然对立,而是致力于寻找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礼记·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和合智慧,为“合作共赢”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中国有识之士认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只有帮助他国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只有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保障本国安宁。这种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统一起来的宏大视野,使得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和广泛的认同基础。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是对“和”文化简单复刻,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结合本国国情,对其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中国道路将“和而不同”提升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面对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国坚定倡导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并以此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这正是“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社会原则中的卓越体现。其次,中国道路将“以和为贵”的传统智慧,升华为以共同发展谋求持久和平的核心战略。坚持自身和平发展,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将中国的发展机遇与世界共享,致力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再次,源于深厚的“王道”文化底蕴,中国道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主张。中国政府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对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追求,正是古代“王道”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发扬光大。

二、现实逻辑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建设营造和平发展效能优势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深刻植根于其基本国情、价值追求与时代方位。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其独特的内部规定性和内涵建设成效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和平发展的现实逻辑基础。这条道路,并非权宜之计或外部压力的产物,而是中国基于自身超大规模体量和内在发展逻辑的主动选择与历史必然。

(一)人口大国的和平选择:超规模现代化的内生性逻辑

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基本国情密不可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实现复兴伟业的基本盘。人口规模的巨大化决定中国发展必须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循环、科技创新和资源节约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国情构成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源性动力。

人口规模是对发展模式的内在导向。其一,资源环境压力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资源节约、内部循环的发展道路。中国以占世界仅9%的耕地^{[4]221}和6%的淡水资源^{[4]228},养育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任何试图通过外部扩张来转移资源环境压力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5]1512}这既强调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隐含了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生存发展的深刻逻辑。其二,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赋予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与战略韧性。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庞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空间,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更多依赖国内循环,减少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可能的国际经贸摩擦。其三,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是矢志不移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集中精力处理好内部事务,协调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任何外部军事冒险都可能对国内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因此,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有效应对内部治理挑战、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二)共同富裕的和平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21}。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这一本质要求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暗含着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是把握外交战略稳定性的关键。其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筑牢了和平发展的国内根基。共同富裕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历史经验表明,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往往是内部动荡和对外转嫁矛盾的温床。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有效调控收入分配,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能够不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其二,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中国积极成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习近平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强调中国“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7]66-67},这正是中国追求共同富裕逻辑的国际自然延伸,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其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的公平正义理念具有全球感召力。在国际上,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中国的和平发展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认同。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内在规定了中国必须以内部建设为中心,以和平发展为国际战略的现代化路径。其一,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决定了对外战略的非扩张性。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追求资本的无限扩张或领土的对外占有。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8]1}而解放生产力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就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通过对外掠夺来缓解内部矛盾的经济必要性。当一个国家的战略重心始终聚焦于内部发展和民生改善时,其对外政策自然呈现出和平性与建设性。其二,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战略定力。共同富裕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持续扩大,国内市场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从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9]114}。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超大规模市场,赋予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和韧性。这种以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增长模式,减少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过度依赖,降低了因争夺外部经济利益而与国际社会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使中国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

(三) 双轮驱动的和平支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共进

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不仅取决于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硬性指标,更深受其内在价值追求与文明形态的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更是精神力量、文化自信和国民素质的全面飞跃。

理解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和平发展的内在联系,是把握中国战略行为长期性、稳定性的关键。其一,物质文明是走和平发展的必要基础。邓小平做出重要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10]37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增长,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为我们捍卫国家利益、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盾牌。这使得中国有能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发展问题,而非通过对外扩张或掠夺来转嫁内部矛盾。其二,精神文明是走和平发展的内在引领。如果仅有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精神世界空虚、价值导向偏离,则可能陷入追求霸权、炫耀武力的困境。中国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凝聚力。其三,两大文明的协调增强了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韧性。丰裕的物质基础能够承受外部冲击,而坚定的文化自信、昂扬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则能使国家在风浪中保持战略定力。这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紧密结合所形成的综合国力,是中国能够长

期坚持和平发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的深层底气。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了其对外战略的吸引力、感召力和持久力,为和平发展提供了多维支撑。首先,两者协调发展有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增强和平发展的道义力量。中国通过自身实践向世界表明,其发展追求的是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非单纯的物质积累或武力扩张。这种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结合的担当,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更具道义合法性和感召力,能够有效化解“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其次,精神文明赋予文化软实力,为和平发展营造有利国际舆论环境。和平发展不仅需要硬实力的保障,更需要理念的传播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平、包容、和谐等思想,以及当代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以文化人、以德服人的“软实力”,是维护和平、促进合作的无形纽带,其作用往往是军事威慑和经济手段无法替代的。物质文明为和平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硬实力保障,消除了因贫弱而受制于人的风险;精神文明则为和平发展注入了价值引领和文化基因,确保了强国之路始终沿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延伸。两者协调发展,共同塑造了中国的稳健姿态、负责任形象和强大韧性,使得和平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战略的选择和文化的自觉。

(四) 生态文明的和平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现代化模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这种以征服自然、无限索取为特征的发展路径,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更常常成为国际间争夺环境资源、转嫁污染冲突的根源,对全球和平构成潜在威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并指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首先,从“征服自然”到“和谐共生”。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深受人

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将自然视为征服、改造和无限索取的对象;而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动体现了发展价值的根本转向,把生态环境保护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从思想源头摒弃了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短视行为。其次,发展模式的转型。从“线性消耗”到“绿色循环”。传统工业化模式是资—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开放式过程,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正如《荀子·天论》所倡导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尊重和永续发展的长远眼光。这从经济基础上消除了因国内资源环境危机而向外转移生态压力的内在冲动。再次,治理体系的重构。从“事后补救”到“系统保护”。该理念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通过构建由绿色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技术等构成的系统性治理框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得到有效落实。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刻反思并超越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构建可持续的全球生态安全格局提供了“中国方案”。首先,夯实国内生态安全根基,消除内部冲突诱因。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其次,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助力应对共同挑战。中国不仅是生态文明的实践者,也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行动派。中国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提出“双碳”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再次,习近平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倡议,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与各国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和
技术。

(五) 国际交往的和平导向:合作共赢
的现代化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了通过殖民掠夺、
集团对抗实现自身发展的传统模式,旗帜鲜明
地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
国外交政策的宗旨^{[3]266-267}。它标志着中国在
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始终将自身发展与
世界共同福祉紧密相连。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的提出与实
践,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与发展哲学
的革新,它从根本上超越了零和博弈的陈旧思
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包容性、开放性和
利他性的先进元素。其一,对传统现代化逻辑
的超越: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近代
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殖民
扩张、激烈的势力范围争夺和残酷的战争,其
底层逻辑是认为世界资源有限,一国所得必为
另一国所失的“零和博弈”。中国基于对历史
教训的汲取和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深刻理解,
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其
二,对国家利益观的升华:从“独善其身”到
“兼济天下”。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国家利
益,是建立在促进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更具
包容性和长远性的利益观。它不再将本国利
益与他国利益截然对立,而是致力于寻找利益
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其三,路径的创新:
将和平与合作内嵌于现代化进程。这一理念
并非外在于现代化进程的辅助手段,而是其内
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中国
的现代化不是在孤立中实现,而是在更加开放
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不是通过剥削他国完成原
始积累,而是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获取发展动
力。这种发展路径的创新,从战略层面确保了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是稳定因素的
增强,是合作机遇的扩大。

和平发展理念引领构建全方位的战略体
系。首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打造互
联互通的合作平台。这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
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将中国

的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形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效应,为和
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利益纽带。其次,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引领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在这一愿景指引下,中国积极参与和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落地,致力于在
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平等、合作、共赢
的要素。这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减少国际社
会无序竞争和冲突提供了中国方案。再次,以
深化对外开放为动力,筑牢互利共赢的经济基
础。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扩大
进口,积极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与世
界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中国通过自身更
高水平的开放,使合作共赢的理念在经济领域
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持续不
断的经济动能。

三、国际逻辑进路:从独立自主到全球
治理展示和平发展功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进程中,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统筹发展与
安全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紧密结合,探讨从独
立自主到全球治理的和平发展之道,形成比较
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历史经验及国
际逻辑进路。

(一) 独立自主的奠基:冷战格局中的
和平突围(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正值美苏两极对
峙的冷战格局全面形成之时。作为一个新生
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无法超然于冷战之外,
反而因其巨大的体量和地缘战略价值,成为两
大阵营争夺或遏制的焦点。

基于此历史现实的态势,党中央做出了
“一边倒”的战略抉择。其一,“一边倒”战
略的必要性。当时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拒不承认新中国并实施严格封锁禁运。相反,
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并提供重要的经济、技术
乃至军事援助。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国际上
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

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1475}“一边倒”使新中国迅速打破了外交孤立,获得了巨大支持。其二,“以斗争求和平”的实践。即使在“一边倒”的框架下,新中国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绝非苏联的附属。最突出的体现便是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这场战争是以战止战、以斗争求和平的标志。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战略抉择也随之改变。第一,转为“两条线斗争”理论。即坚持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不再接受“老大哥”的领导,转而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独立自主性的空前加强。尽管这一时期外交环境更为险恶,但中国顶住了来自美苏的双重压力,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捍卫领土完整,并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第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毛泽东将介于美苏之间的广大国家分为“两个中间地带”:第一个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第二个是西欧、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它将中国的外交视野扩展到整个国际力量格局,主张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

中国和平发展理论根植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对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做出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摒弃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开辟一条属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道路。其一,确立独立自主这一根本立场。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5]1465}这一原则成为中国外交不可动摇的基石,意味着中国的和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国家主权完全自主的必然选择。其二,提出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在继承和发展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基础上,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

原则。这五项原则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准则基础。其三,明确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基于对世界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要团结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曾沉痛地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11]340}这种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决定了新中国绝不会走西方列强那种依靠殖民掠夺和对外扩张实现现代化的旧路,必须选择一条和平的、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 开放合作的发展:改革开放中的全球融入(1978—2012)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转变。与前一个阶段在冷战夹缝中寻求“突围”与“自立”不同,这一阶段的核心主题是“融入”与“发展”。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其内涵不断丰富。一方面,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为中国之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重要国际环境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中国外交制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强调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原则、量力而行、发挥积极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与国家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其核心逻辑在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又需要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在全新理论指引下,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主动、务实的外交实践,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

“局外人”到“参与者、维护者、建设者”的身份转变。第一,全面加入国际经济与多边机制:中国不再将现存国际体系视为完全对立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可以借力发展的平台。第二,经济融入。中国积极吸引外资,兴办经济特区,并于2001年经过漫长谈判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是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接受了全球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开启了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的黄金时代。其三,多边外交。中国改变过去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谨慎态度,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日益活跃,深入参与国际军控、裁军、环保、人权等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例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其四,构建“伙伴关系”网络,超越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外交彻底告别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转而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从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与东盟共建自由贸易区,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伙伴关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周边环境和国际氛围。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0]105}这一判断决定了中国此后几十年内政外交的根本方向。其意义在于:一是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战略需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必然要求中国推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二是应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塑的复杂挑战。三是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高度战略自信和政治智慧,确保了中国在世界多元化格局中沿着和平发展的航向稳步前行。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邓小平始

终坚持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三) 命运与共的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赋能(2012—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中国和平发展这一阶段,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参与者,而是以更加自信、主动的姿态,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实现了从“融入”到“赋能”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了一个以提供公共产品、贡献中国智慧、塑造共同未来为特征的深化阶段。

理念赋能为世界发展提供共同价值取向。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系化构建。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这一理念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先后提出并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具体领域共同体建设,使这一宏大理念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思维,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与弘扬。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了西方宣扬“世界价值”的话语垄断。这些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既体现包容性,又坚持原则性,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开展全球治理合作奠定了价值基础。三是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化发展。中国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交往范式,指明“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传统的霸权稳

定向共商共建共享转变。

实践赋能为世界提供务实管用的公共产品。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提供的最大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已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人民“心联通”。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2]55}这一倡议通过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二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协同推进。三大倡议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立体性框架。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推动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这三大倡议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三是参与全球治理各领域的深度参与。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做出“双碳”承诺,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实施;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抗击疫情合作,践行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在数字治理领域,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推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在维和领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这些具体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各领域的建设性作用。

制度赋能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一是维护多边主义的核心地位。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各机构工作,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不断提升,同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三是创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主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已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对话机制日益成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在中国积极参与下不断发展壮大。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4] 中国统计年鉴202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陈 坤 王 冉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摘要]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造就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主体支撑、物质支撑、精神支撑。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伟大复兴面临共同体成员“数”“质”的制约、共同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两个大局”引发的风险叠加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以下路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是壮大共同体主体,驱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建设经济共同体,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强化文化共同体,推进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塑造生态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构建责任共同体,推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1-0018-09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111-112}的重要性。这一论断的提出源自各民族是“一体”: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五个共同”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图景,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优势条件以及磅礴的共同体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再次凸显了“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和“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各族人民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优势,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全面复兴。

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主体支撑

从国家性质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经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民族团结理论的架构与解析研究”(项目编号:19BMZ005)。

[收稿日期] 2025-03-20

[作者简介] 陈 坤,女,四川青神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王 冉,男,山东新泰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由宪法确认的国家主体,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3]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有着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基础、近代革命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和谐互助基础,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突出地表现为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是国家发展之基、民族团结之本,只有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才能保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主体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9]这说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链接各族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纽带,具有深厚的理论、历史与现实基础。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对社会存在有促进作用。中华各民族构成了客观存在的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体的意识反映,可促进各族人民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团结各族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境内各民族始终坚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携手发展经济、开疆拓土、抵御外侮。即使在革命时期,各族人民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坚持平等团结互助等原则,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进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和民族工作发展新趋势,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从现实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还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其中影响全局的关键因素就是各民族的“多元”能否紧紧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一体”,而这就需要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团结各族人民为一体,融合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公民意识为一身的集体意识,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主体支撑。

(二)各民族共享自然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

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祖国之内,开拓了辽阔的中国疆域和稳定的生存空间。“共同生存空间内部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使各民族的经济互补成为可能,也构成了各民族形成经济上相互依存格局的发展逻辑。”^[4]我国各族人民共拥共享富饶的物质资源和多样的生活空间,一直保持资源互通、经济互联,结成了密不可分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逐步发展成为经济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厚植坚实的物质条件,必须立足实际,即从国家和民族的客观经济条件和资源条件出发谋划发展。中华民族谱写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以及各民族、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发展经济方面拥有独特的历史经验。自古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就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封建时期,各族共同开辟“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经济线路,一度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清王朝的衰落促

使各族人民进行深刻反思,并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革命,各族人民在革命期间也不忘发展经济以推进革命进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国家和民族“一穷二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继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努力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经过新时代的接力奋斗,中华民族谱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次,中华各民族共同拥有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互补的自然资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优劣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5]216}。地理环境中蕴藏的丰饶自然资源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条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贮藏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之中的自然资源是推进现代化的基石。从现实看,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拥有庞大且互补的资源储备,如中部地区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资源,东北地区的黑土地和森林资源,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资源,西北地区的草原、风力和太阳能资源,西南地区的水利和矿产资源。各族人民共享且互补的自然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绩。同时,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能量,是各族人民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出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转化,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绿色生态经济,这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即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三)各民族共建精神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6]6}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显著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从本质上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益于各民族的文化相通,这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基因。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由此成为精神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精神交融不仅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各族人民的精神现代化和激发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是其内在要求。因此,必须牢牢抓住中华民族的“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也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贡献,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文化层面、精神文明层面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在规律和真实写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变得更加普遍和深入。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高速发展,拓展了民族间的交往形式和交流方式,促进了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和大融居,使得各族群众在生活方式、风俗文化、语言文字、学习工作等方面的交流碰撞更为频繁和深入,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现实条件。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实现各族人民的心理互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其次,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坚持“第二个结合”对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至关重要。“‘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7]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蕴藏着浓厚的民族叙事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等,经过“结合”可以更好地用于中华各族人民互相加深情感、统一理想信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扎根中华文化的土壤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天下大同”等中华传统价值理念赋予中国式现代化自信自强的底气、以人为本的宗旨、创新驱动的战略、胸怀天下的格局,指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质言之,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只有以推进“第二个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终使得各族人民在精神文化层面达成团结统一,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新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力量。

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一) 共同体成员的数量下滑与质量短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伟大转变的中华民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8]从这个意义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中华民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历史实践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拥有者和推进者。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强弱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效和质量。

首先,人口负增长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持久力。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且“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将表现出‘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特征”^[9]。一方面,尽管有关部门积极地推出了“二孩”“三孩”“生育津贴”等政策以促进人口增长,但受到高房价、高彩礼、高养育成本及高教育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结婚率与新生儿出生率并未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这可能导致中华民族成员的整体数量逐步减少。另一方面,我国过去依靠人口数量红利拉动现代化发展,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数量优势和巨大国内市场需求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可能会出现明显减弱,进而影响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其次,人口质量的亟待提升约束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在力。人口质量也可称为人口素质,一般指涉人们的身体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反映了人们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近年来,我国各民族的人口质量不断上升,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飞跃,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我国人口质量面临诸多问题。在身体健康素质上,我国的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肥胖病问题日益严重;在思想道德教育上,多元文化思潮、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等问题为各族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增添了许多阻力;在科学文化素质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数字鸿沟与普及政策等限制了各族人民提升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可见,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难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克服的重要问题,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二) 共同体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需要发扬问题意识、坚持系统思维、进行辩证认识。一方面,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各民族虽然共同享受到了现代化成果,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内因。

首先,经济和文化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束缚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第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区域之间的生产总值上。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东部地区生产总值652084亿元、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69898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69325亿元、东北地区生产总值59624亿元^[10]。这显然可以看出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第二,文化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为文化产品不能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从文化产业来看,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53782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46%^[11],说明文化产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从文化产品来看,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层次不高,精品、爆品的产出量较少、供给层次相对较低,不能较好地满足人民需求。第三,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其次,社会和生态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与永续发展。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进步,但是依然存在一些由于主客观因素造成的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第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城乡区域之间受地理环境、国家政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情况的影响,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边疆地区较为欠缺,譬如出行条件不便、医疗水平较低、教育资源不足、文化和体育设施缺乏、养老保障不完善。第二,基层地方没能很好地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意或无意地妨碍了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设计并出台了一系

列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但是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存在监管不力、行动滞后,企业或个人弄虚作假、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现象。二是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和治理能力相对较差,配套设施不足和生活理念固化导致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相对困难,且缺乏负责生态治理和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监管人员。

(三)共同体面临“两个大局”带来的风险叠加

“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始终是快速发展的第一要务,而发展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12]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汇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两个大局”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在前进道路上一刻也不能松懈,如何正确辨别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坚决防范民族区域发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帆风顺的根本前提。

从国内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三股势力”的阻碍。“三股势力”主要是指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它们是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团结的最大隐患。“在中国,‘三股势力’的根本目标是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其理论基础和动员口号是以‘双泛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犯罪是其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12]“三股势力”曾经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带来严重伤害,破坏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给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十八大以来,我国反分裂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要看到我们同“三股势力”的斗争将是长期、复杂而艰巨的,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国际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遭到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围追堵截。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但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打压。一是在经济领域挑起贸易战、金融战,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强行征收超出规定以外的关税,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正常经营强加干涉,甚至不惜设置中国企业“黑名单”,阻挠中国对外发展经济。二是在高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发展,一些反华势力明令禁止或限制企业和个人在中国先进技术领域的投资、合作,企图遏制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制造“中国威胁论”,企图挑起“新冷战”来孤立中国;同时,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潮通过网络媒介传入中国,危害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对“两个大局”相互交汇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只有做到准确识变,才能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大变局”中开顶风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 壮大共同体主体,驱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它把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实现各族人民的现代化需要把促进各族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设高质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体作为重要前提。因此,必须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积极有为的主体活力。

首先,注重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质量。一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其养成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

和道德责任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完善和优化全民终身学习机制,系统全面地培养各族群众的现代生活习惯与劳动的知识技能,让各族适龄劳动人口具备与现代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相匹配的知识与本领,推动“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三是稳步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完善全民公共健身设施和场所,倡导全民参与锻炼、增强体魄;整合利用和系统完善基层疾病预防、医疗服务和保健康复资源,重视食品安全问题,要加强监管、标本兼治。其次,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数量。一是从实际出发,加快研究和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健全系统全面、覆盖城乡的生育保健服务,逐步降低育孩、养孩成本,为各族人民生儿育女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二是依法维护女性在求职就业方面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民政、妇联等部门的职责功能,保障生育津贴和产假等福利落实到位,严厉打击歧视和排挤女性的现象,提高适龄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二) 建设经济共同体,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地发展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经济相依的各民族成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3]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因此,需要通过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改进收入分配体系两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更加公平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提高资源流通和配置效率,把“蛋糕”继续做大;二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帮扶机制,补齐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资源的短板；三是搞好调查研究，切实掌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现状和优势，依靠“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与“东北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激发落后地区破解经济发展困境的内生动力。其次，不断改进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一是强化第一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二是更好发挥第二次分配的调整性作用，适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防止两极分化；三是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与法律法规支持和保障慈善捐赠、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等，举全社会之力帮扶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

（三）强化文化共同体，推进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根源于各民族在文化互鉴、融通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3]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积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深沉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攻坚克难的牢固精神纽带。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要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既要管好“肚子”，更要管好“脑子”，经济建设取得十足的收获，文化建设也要迎头赶上，这顺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之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从以下途径加快建设精神文明，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首先，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的宝贵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诗词歌赋、文学著作和语言文字等内容，富含许多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文故事和情感素材，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首先要紧紧抓住的根；承载革命文化的伟大精神、革命遗址和文艺作品

映射着各族群众同心同德、追求解放的革命实践，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和浸润的集体记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刻骨铭心的宝贵遗产。只有不断结合新时代的条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的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进行转化、发展，才能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群众精神生活富裕。其次，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行动指南，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髓的先进文化可为建设精神文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最后，坚持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各民族文化包容互鉴造就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现实将继续证明，只有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才能更好发挥“多元一体”优势，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必须同各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样，推动各民族文化与时俱进、蓬勃发展，融汇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内生力量，引导各族群众共享民族特色文化，让民族特色文化汲取各族群众智慧实现新发展。

（四）塑造生态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长远来看，保持生态平衡及其正常运转的能力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3]我国各民族世代共同在祖国大地上生存，同享辽阔疆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由此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有着共同的思想认识条件，即塑造各族群众的生态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逐步实现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美美与共。

首先，加快转变城市民族工作方式，建设各族城市居民的生态共同体。一是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要求全国各地区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引导城市本地居民和各族流动群众实现共同生活居住、共同工作奋斗,共建共商共享天蓝、地绿、水清的绿色美好城市。二是提高基层民族工作水平,加强街道、乡镇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生态共同体意识教育,确保其在工作中坚持平等、团结的原则服务各族群众,处理好建设城市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三是深化不同城市间民族工作经验、生态建设经验的交流互鉴,要把经验学习和地区特点结合起来,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方式方法,强化各族群众的生态共同体意识。其次,做好“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引导帮助各民族实现生活空间互嵌。一是打造生态共同体建设的模范社区和先进个人,发挥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二是根据不同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生态共同体意识教育方式,比如对老年人可选择民族歌舞、民俗节日等社区活动,对年轻人和上班族可选择抖音、微博、微信等移动软件,对学生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可选择课堂教育、讲座会议、实地调研等方式。三是依托基层党组织、居委村委和公益性岗位等,做好各族群众的关怀工作,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帮助各族群众互相融入。最后,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生态共同体。一是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清洁能源入户,因地制宜做好生活污水净化处理工作,正确处理各族乡村群众的生活垃圾。二是普及现代生活内容和知识,推广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和出行方式,倡导各族群众共建和谐社会和美丽乡村,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睦共处。

(五) 构建责任共同体,推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责任’与‘共同体’是一对具有共生性的概念,责任要素在共同体的构建、互动、维系、扩展和规范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14] 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承担对于共同体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

好合作,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世界贡献了诸多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方案,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从“两个大局”相交织的复杂时代条件出发,必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对话,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互相尊重、平等原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经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从国际上看,只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才能开展平等对话,通过协商解决争议问题、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其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世界各国的共商共建共享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特别强调“共同”,而不是“单一”;都坚持追求“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事实证明,只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才能更好地借助“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平台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最后,坚持开展不同文明的沟通交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文明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国家和民族强大的“软实力”。中华民族始终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在不断地包容互鉴中形成的。“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求同存异,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历久弥新的历史文化‘密码’。”^[175]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人类文明终将会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交流互鉴中稳步发展。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持开展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促进人

类文明繁荣兴盛。

经过几千年长期积累和交融汇聚才产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基础,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团结基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追求独立和解放,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艰苦探索,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因素。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就是不断强化共同性、巩固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合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为其他众多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8(2).
- [4] 王延中,宁亚芳,章昌平,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21(9):1-9.
- [5] 斯大林.斯大林文集(1934—195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7]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9-01(1).
- [8] 高永久,冯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团结奋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7-28.
- [9] 翟振武,金光照.中国人口负增长:特征、挑战与应对[J].人口研究,2023(2):11-20.
- [10]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4-02-29)[2024-11-20].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 [11] 国家统计局.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46%[EB/OL].(2023-12-29)[2024-11-20].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5.html.
- [12] 穆赤·云登嘉措,杨本加.国家安全视域下的“三股势力”问题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22(3):164-169.
- [13] 程刘畅,李戈.公平正义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逻辑蕴涵与实践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24(2):20-28.
- [14] 毛维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责任共同体构建[J].国际展望,2022(4):21-38+153-154.

(责任编辑 光 翟)